

日本报社 20 世纪前半期东亚问题调研机构与人脉¹

土屋礼子

主讲人简介

土屋礼子，1958 年生于日本长野县。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研究院教授、早稻田大学 20 世纪媒体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为媒体史、历史社会学等。主要著作有《大阪的锦绘新闻》《大众报纸的源流——明治时期小新闻的研究》和《从对日传单解读太平洋战争》。

卓南生（北大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学术主任、“北大新闻学茶座”主持人）：我们北大新闻学茶座第 27 次活动现在开始，土屋老师的主讲题目是“日本报社 20 世纪前半期东亚问题调研机构与人脉”。土屋老师和我是老朋友，20 多年前土屋老师还在一桥大学山本武利教授的指导

1 本文据“北大新闻学茶座”第 27 次活动（2013 年 3 月 16 日）的主要内容整理。

下攻读博士课程时，曾在日本新闻学会做了一次出色的报告，当时大家都认为她是颇有潜力的学者。现在，土屋教授在早稻田大学任教。早大新闻系实际上在 1969 年就关门大吉了，我是早稻田大学新闻专业的最后一届毕业生，所以，对早大新闻系有着较特殊的感情。我们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曾成立同窗会，每五年会召开一次会议，要求校方复办新闻系。前几年，校方终于在政治经济研究院里设立了新闻学方向的课程。尽管这和我们新闻系毕业生的要求相差甚远，但同窗们还是挺高兴的。另外，土屋老师的研究跟我的研究有相似之处，都是搞新闻史。新闻史在日本跟中国一样都是冷门，所以，我们新闻史研究者彼此都认识，并都相互关心对方的研究动向。土屋老师的研究是从明治时代有关日本大众报纸的源流着手进行的，这是她博士学位论文的课题，据说中文译本很快就会面世。另外，她最近的成果是有关太平洋战争期间传单的研究，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研究课题。今天的翻译者是北京大学日语系博士生葛奇蹊同学。

接下来请土屋老师主讲。时间具体安排如下：前一个小时交由土屋老师，然后休息大约十分钟，剩下的时间则是互动。

研究缘起

土屋礼子：大家手头可能都有我草拟的提纲了，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日本报社 20 世纪前半期东亚问题调研机构与人脉”。主要内容是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就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期间，日本报社所设的一些有关东亚的组织以及其中一些人员的活动情况。我选择这个题目跟我的专业背景有关系，我主要研究新闻史，从 19 世纪 70 年

代到 90 年代明治时代的日本新闻史。这个时期之后的一段时间，日本的新闻业界有很大的发展，首先是大众化，然后是产业化，相关的企业也发展起来。但与此相比，中国的新闻业似乎没有太大的发展。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也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有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来到了日本，于是，日本出现了不少熟悉日、中两国媒体的人士。另外，日本人也接踵而至在中国发行报纸。我对此动向非常关心。

对于 1920 年以后日本人在中国或东亚出版、发行报纸的研究著作是有一些的，这些研究在范围上涵盖东亚的朝鲜半岛、“满洲”、天津、上海等地域；出版媒体的使用语言既有日语，还有中文等。但是，深入的探讨研究著作可谓凤毛麟角。研究薄弱的理由大体上有两个：一是系统保留下来的报纸和杂志的一手资料较少；二是对当时的日本媒体，尤其是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媒体的评价比较低。也就是说，协助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和宣传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新闻媒体被认为是日本的国策媒体，是没有研究价值的。我也因此对于 30 年代到 40 年代的报纸没有进行直接研究的决心。所以，我做了如下这样一个课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针对日军制作的传单研究。我走访了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收集相关资料，并就“对日心理战”是怎么回事进行了分析，通过这些资料，我也知道了盟军是怎么对日军进行心理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为对占领下的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不仅搜集了许多关于日本的信息，也获得战时日本外务省、“满铁”和军部关于中、朝等殖民地的大量情报。这些情报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当时日本报社及其相关情报调查机构有关这些殖民地的调查记录。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历来都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当时媒体如何报道战争上，但我觉得这还不够，我想进一步探讨当时的日本报社是如何设立这些情报调查机构的？又是怎样收集资料的？由于这方面的资料收集还比较少，还不够

充实，我今天只能以阶段性成果发表的形式来汇报一下我的研究状况。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日本报社的亚洲报道和对亚洲的认识。要了解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先了解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日本报社所设立的有关东亚的研究部门，比如除了“东亚调查会”这样的情报机构外，还有负责新闻报道的、广泛分布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东亚部”。大家可以注意到“东亚”这个词，本来在 20 世纪初的日本大正时期设立时叫作“支那部”，后来才改成了“东亚部”，之所以更名跟他们对亚洲认识的改变不无关系。

当时日本各大报社在中国大陆各地设立了很多分社，时间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关于“支那部”改成“东亚部”的具体原因，我的调查还不是很充分，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东亚部”不是在 1945 年日本战败后就自然消失了，它一直存续到 1949 年。接下来，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是与东亚相关的情报调查机关。《每日新闻》设立了“东亚调查会”，《朝日新闻》设立了“东亚问题调查会”。《每日新闻》的“东亚调查会”始于 1929 年，1945 年自动解散，它的后身叫“亚洲调查会”，主要是由“东亚调查会”出来的这些人成立的；《朝日新闻》的“东亚问题调查会”在 1934 年创立，由时任主笔绪方竹虎提倡建立。这两个组织的主要工作不是报道新闻，而是收集中国大陆方面的信息来进行分析和讨论，同时也包括出版活动。

《每日新闻》社与“东亚调查会”

《每日新闻》社的“东亚调查会”创立于 1929 年，发起人是时任每日新闻社的社长本山彦一，同年 7 月 27 日在东京开始活动。在同年的

元旦当天，每日新闻社就提出了两个构想，一个是设置东亚调查会，另一个是开展健康增进运动。这两个构想的理念是新闻组织除了重视报道之外，还可以从事其他贡献社会的活动。“东亚调查会”的基本任务是作为对东亚各方面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特殊机关，广泛委托各方的有识之士担任顾问和评论员。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机关呢？因为，当时的政府和政党忙于政治斗争，“东亚调查会”是为了“东亚百年国策的树立”而设立的。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情况不是很稳定，共产党活动比较活跃；此外，军部也逐渐掌权。

“东亚调查会”列了许多章程，也许大家看了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第一条是在总部内部设置调查会；第二条是东亚调查会对东亚各国范围内与日本有紧密利害关系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根据需要公开研究成果。目的包括以下几项：除了要普及与东亚相关的知识以外，对于与该会立场一致的个人或团体提供适当的协调与援助，向当局提出建议或唤起舆论关注，通过实际手段获得效果。这里提醒大家注意：如何“通过实际手段获得效果”，这是比较关键的一点。第三条写到，本调查会的主张和活动与《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英文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等报社无关。本条中提到了四个报社，其实它们是一个组织。章程上虽然明确表示与报社无关，但实际上是有联系并接受其资助的。第四条就清楚指出该会的本部设在大阪每日新闻社社内。第五条规定正、副会长由每日新闻社董事会推荐，专任理事也是由董事会来推荐。宣称跟每日新闻社没有关系，但正、副会长却由每日新闻推荐，两者的关系耐人寻味。

调查会会长从一开始就由本山彦一担任，他去世后则由德富苏峰接任，但并非是会长，而是以顾问的形式来参与的。当时的专任理事是榎崎观一，常任理事为黑田乙吉，主事是松本鎗吉和引田哲一郎。关于这

些人物，接下来我还会做介绍。至于该会的理事，则包括每日新闻东亚部部长田中香苗、西部东亚课长高桥公彦、出版次长马场秀夫，还有战后非常有名的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的父亲丸山干治，他是客座研究员；此外，还有论说委员森正藏。顾问共有 14 名，评论员有 38 名，其中包括陆军大将宇垣一成、每日新闻社社长奥村信太郎和近卫文磨公爵、光永星郎贵族院议员等军部和新闻社的人以及议员等。我们从中能看出报馆与政府官员、议会和军部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对他们各自的工作也是比较有利的。

东亚调查会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呢？我的调查迄今为止可以列出以下几条：

首先，是提出问题让大家进行讨论，然后做出建议和决议。其中有一条建议是“在中国动乱期确保海陆交通等四项”。1931 年 9 月，该会又提出“主张日本在满洲的自卫权”的建议；1932 年 9 月提出了“排斥国际联盟的干涉”。看了这些建议，不难看出调查会和当时日本的国策是并行不悖的。

其次，是出版刊物，目前总体情况还在调查中，我暂时列举一些。比如，1933 年出版了手册《围绕支那满洲的各种问题》；德富苏峰主办的杂志《东亚问题研究》，从 1940 年创刊开始到 1942 年一共出版了 6 期，前面介绍过的几位主要的理事也投稿给该刊。这份刊物的主要目的就是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后来又发行了叫《东亚调查会》的手册。主要内容是有关亚洲各地域的问题，比如，1942 年的《焦点下的北方问题》；1943 年的《南方报告》，内容着重探讨当时苏门答腊军政统治面对的各种问题以及爪哇岛建设的问题；1944 年出版了《支那问题解决的途径》。

此外，东亚调查会还做了很多工作，详情有待我进一步调查和研究。

就记载来看，这个组织在 1945 年 8 月以后就自然解体了。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些组织中的一些人，他们不但活跃在战争时期，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仍然留在媒体工作。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具体人物是曾任《每日新闻》社东亚部部长的田中香苗（1904—1985）。他在日俄战争时期的 1904 年，出生在日本的香川县，后来在日本人于上海建立的东亚同文书院学习，毕业后曾教授中文和中国的文化。这个学校培养了很多在亚洲地区活动的日本人才。东亚同文书院在日本战败后就自然消失了。它与日本爱知县的爱知大学是很有渊源的，爱知大学创立时要以东亚同文书院来命名，但未获得 GHQ（盟军总部）的许可。田中香苗在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先后曾担任《每日新闻》天津支局员；接着又到奉天当了特派员，写了《现代支那的变更过程》（1938 年）、《东亚的开展及支那的史观》（1939 年）和《汪兆铭与新支那》等著作；其后成为每日新闻的东亚部部长。1949 年他又担任了综合技术调查室的室长，曾经参与创建《每日新闻》东京广播电台。接着他分别出版了《新闻和新闻记者》（1949 年）和《从军记者：日本战争外史》（1965 年）两本著作。1956 年成为每日新闻社的董事；1961 年任每日新闻社董事社长和编辑主管；1964 年成为“亚洲调查会”的副会长；1968 年任会长主笔，70 年代担任代表董事社长，他的活动时期十分长。1987 年有一本传记出版，名字是《回顾田中香苗》。

另一个值得向大家介绍的人物是榑崎观一（1885—1965）。他主要是从事朝鲜问题的研究，代表作是《满洲、支那、朝鲜：新闻记者 30 年》（1934 年）。战前他在“满洲”、朝鲜和中国十分活跃，是这方面的专家。榑崎观一的其他著作还有：《朝鲜最近史》（1912 年，共著）、《欧战后的支那》（1921 年，译著）、《兴亚建设的基础知识》（1940 年）、《大陆行路》（1943 年）和《新闻记者五十年》（1955 年）。关于榑崎观一，以后我还

会做进一步调查。

马场秀夫(1901—1979)是对苏联问题比较熟悉的记者。他的著作有:《实地观察下的苏联》(1934年)、《大东亚战争和国际形势的展望》(1942年)和《苏联的潜力》(1943年)。

松本鎗吉主要关注中国方面的问题,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他的著作有:《支那的政党》(1919年)、《各国在支那的权益》(1941年)、《支那问题的解剖》(1942年)、《支那的保甲制度》(1943年)、《毛泽东传》(1946年)和《中国人的特性和生活》(1947年)。

黑田乙吉(1888—1971),出生在福冈县,毕业于熊本师范学校。那个年代的记者和新闻业界人士,出身于九州的非常多,从事商业活动的也多出身于九州。黑田乙吉比较崇拜列夫·托尔斯泰,在学习了俄语之后前往苏联。他首先担任了《大阪每日新闻》的通讯员,1917年成为莫斯科的特派员并且报道了十月革命。他1920年出版了《令人头疼的苏联》,并对西伯利亚出兵问题进行了报道;担任哈尔滨、莫斯科特派员期间完成关于风俗水土与产业方面的著述(1922年);接着出版了《关于1937年的北冰洋工作》(1938年);返回《每日新闻》本社后黑田乙吉撰写了《苏联塑像》(1948年);1951年他成为国会图书馆特别调查员,译有《特鲁斯特依人生读本:永远的灯火》(1968年)。他曾任苏联研究会的专务理事。东京大学也设有黑田乙吉文库。

中保舆作主要研究朝鲜问题,也写过中国的报道,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的著作有:《满洲国皇帝:新帝国创建秘史》(1935年)、《是红色亚洲还是防共亚洲》(1937年)、《汪兆铭和新中央政府》(1939年)、《最近支那共产党史》(1940年)、《大东亚共荣圈的基本理念》(1941年)、《新朝鲜的政治形势》(1946年)、《韩国的政变和实际情况》(1960年)和《日韩新时代》(1965年)。

橘善守（1907—1997），曾任《每日新闻》天津分社的论说委员长。后来写了《应邀看到的中国》（1956年）。1956年获得沃恩上田纪念国际记者奖。

吉冈文六出身于熊本县，是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担任过《每日新闻》北京通讯部员，后转战北京、上海，当过东亚部部长和编辑局长。“二战”之后，辞职归乡，1946年去世。据说他辞职是为了对日本战败负责任。

村上刚也是出生于熊本县，东亚同文书院毕业。他当过《每日新闻》南京分社社长、上海分社社长、东亚部部长和论说委员。

村田孜郎（？—1945），出生于日本的佐贺县，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担任过《大阪每日新闻》上海分社社长，其间出版了《支那的左翼战线》（1930年）；后来成为《东京日日新闻》的东亚课长。著作有《蒙古风云》（1936年）和《宋美龄》（1939年）。后来担任过读卖新闻的东亚部长和上海市政府的顾问。他翻译了不少中国名人的著作，包括蒋介石、郭沫若等。

以上介绍的是《每日新闻》东亚调查会一些成员的情况。

《朝日新闻》社与“东亚问题调查会”

《朝日新闻》的东亚问题调查会在1934年9月成立。这个调查会根据前一年视察过中国东北三省和华北地区的绪方竹虎的构想设立。它成立的目的是想成为与陆海军、“满铁”和大企业一起研究东亚问题的智囊机构。“东亚问题调查会”的首任会长是战后遭到远东法庭审判的战犯下村宏，他曾是台湾总督府的民政长官，后历任《朝日新闻》社副社长、贵族院议员、NHK会长和情报局总裁，战后则成为拓殖大学校长。

调查会的干事神尾茂和常任干事大西斋、太田宇之助、嘉治隆一、波多野乾一等人，也有相似的经历，即战前大都曾在东亚同文书院学习，毕业后进入《朝日新闻》社前往中国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担任特派员，后成为东亚部部长或论说委员，与军部、满铁、外务省来往密切，战后依然活跃在日本的媒体、官方机构或教育领域。

东亚调查会在 1940 年废除了，名字改为“中央调查会”，实际做的工作没有改变。有关它初期的活动还不太清楚，该会初期的刊物，比如《朝日东亚年报》，信息量非常大，可以说搜集了中国各地及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地理、交通、人口等各方面的数据，并进行了理性和冷静的分析。

接下来介绍的是《朝日东亚报告》，一共有五篇文章。第一篇是《香港与海南岛》；第二篇是《满洲》；第三篇是《支那的租借》；第四篇是《北洋渔业》；第五篇是《蒙疆》。它也是收集亚洲地区的数据资料的情报组织。

《最新支那要人传》这部著作记录了 350 名人物的活动，通过照片的方式对每个人进行详细的介绍。这些工作是《朝日新闻》记者协助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朝日新闻》记者收集信息的能力。

下面来介绍一下东亚调查会的组织成员。绪方竹虎（1888—1956），出身于福岡的修猷馆，修猷馆曾先后向中国派出了许多想研究亚洲情况的志士。他后来进入《大阪朝日新闻》，先后担任过政治部部长、“支那部长”、常务理事和主笔等职务。在“二二六”事件后，《朝日新闻》被军部袭击，他负责和军部进行谈判。后来进入政府担任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1946 年被免除公职。但 1952 年他当选了众议院议员，并创设了内阁总理大臣官房调查室，是战后日本情报机关的创始人之一。

下村宏（1875—1957），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进入递信省工作。1915 年任台湾总督府的民政长官。1921 年进入《朝日新闻》社，1930